

中图分类号: I24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8634(2007)03-0111-(08)

论唐代文言小说繁荣与科举制度盛行的关系

俞 钢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上海 200234)

摘 要: 唐代文言小说在初兴期蓄势的基础上, 繁荣期的创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作者蔚起, 名篇如林, 呈现出堪与诗歌媲美的繁荣景象。唐代文言小说的繁荣, 离不开现实的土壤, 尤与科举制度盛行及其造成的文化风尚直接有关。这一时期进士科、制举以及吏部科目选等取士非常盛行, 不仅选拔了一大批才学之士, 而且营造了文言小说繁荣的文化氛围。唐代科举制度盛行给文言小说创作带来了丰富的素材, 而科举士子假文言小说叙写科举环境下的现实人生, 施之藻绘, 扩其波澜, 则将文言小说创作推向了繁荣。

关键词: 唐代; 文言小说; 科举制度

任何一个时代推陈出新的文学现象, 都与这个时代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有关, 唐诗如此, 唐代文言小说也不例外。唐代文言小说兴衰与科举制度的关系, 李宗为曾精辟地指出: “正因为传奇作为进士文学的基本性质从来没有转变过, 所以它紧紧地伴随着唐代进士集团的崛起、衰落而产生、衰微。”^[1](第4章, P171)]李先生把唐代文言小说中被后世称为传奇的作品直接定性为进士文学, 显见唐代文言小说兴衰与进士集团起落之间的密切关系。本文限于篇幅, 仅就唐德宗至宣宗时文言小说繁荣与科举制度盛行之间的关系作些探讨。

—

唐代文言小说在初兴期蓄势的基础上, 繁荣期的创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作者蔚起, 名篇如林, 呈现出堪与诗歌媲美的繁荣景象。一个个独立自足的艺术世界, 汇成了这一时期文言小说的耀眼特色。就作品内容而言, 虽仍不离于搜奇记

逸, 但发掘了更加广泛的现实生活题材, 蕴含着作者对社会人生的理解、爱憎和评价, 思想内涵极为丰富; 就创作形式而言, 许多来自文学“沙龙” 征异话奇的趣谈, 转化为结构完整的文言小说文本, 不仅单篇作品令人称绝, 作品集的大量篇什同样曲折有致; 就叙事手法而言, 虚构技巧精湛, 熔叙事、抒情和议论三者于一炉, 文辞华艳, 刻画传神。可以说, 繁荣期诞生的作品, 代表了唐代文言小说创作的最高艺术成就。

沈既济创作的单篇作品《任氏传》, 标志着唐代文言小说创作进入了繁荣期。

这不仅因为作者史学家身份的特殊, 也不在于作品中明确记有“建中二年” 的创作时间, 最为重要的是作者实践了新的创作观念, 为此期后来的创作活动提供了范本。所谓“察神之际, 著文章之美, 传要妙之情”^[2](卷19, P541)], 就是沈既济渗入作品的创作观念, 由此反映出来的诸如赋予狐精异物更浓的现实人情味、以细致刻画人物为意

收稿日期: 2006-08-30

作者简介: 俞 钢 (1958-), 男, 上海人,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隋唐五代文献与文化研究。

趣的传体写法、叙事曲折完整多用对话的方式等,特别是篇末提升思想境界的议论和渲染文学“沙龙”意趣的补叙等,对其后文言小说的创作影响极大。沈既济的另一单篇作品《枕中记》,叙科举士子卢生梦幻之事,首尾呼应,虚实互衬,现实感强烈,也是后来创作者效仿的名品。

《任氏传》和《枕中记》以下,单篇文言小说蔚为大观,精彩纷呈,各领风骚。李朝威的《洞庭灵姻传(柳毅传)》,记述落第举子柳毅途遇龙女而演绎出的离奇故事,内涵丰富,情节曲折,巧妙地将所要表达的侠义、灵怪、爱情、婚姻等内容熔铸于一篇之中。创作上的关注点,在于一是通过作品中的人物插入了三首楚歌,颇有借洞庭湖畔的风光抒发情感之叹,呈现出诗意化的倾向;二是作品中对话的运用极为高超,强化了不同人物形象迥异的性格。许尧佐的《柳氏传》,叙写妓女柳氏与诗人韩翃(一作翊)悲欢离合的情事。我们注意到,此篇的题材已完全转向现实生活,且创作上于婉转叙事中插入诗歌抒情的手法,运用得相当成功。与《柳氏传》相比,同类题材的白行简《李娃传》,更臻于成熟完美。白行简,“辞赋尤称精密,文士皆师法之”^[3](卷166《白居易传附白行简传》),如此文章高手介入文言小说创作,反映了此期士林对文言小说这种文学样式的青睐。《李娃传》记述妓女李娃与贵公子荥阳生的爱情故事,深刻拓展了主人公所处的科举社会背景,由此塑造的李娃和荥阳生的人物形象贴近现实,栩栩如生,所谓“近情而耸听”^[4](P50)作品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情节起伏摇曳,一波三折,引人入胜;描写细腻缠绵,凄婉欲绝,神韵凸现;结局转悲为喜,积极浪漫,独具匠心。可以说,《李娃传》的成功,为唐代文言小说的繁荣增添了灿烂的篇章。

此期对文言小说创作情有独钟的要数李公佐,他先后创作了《南柯太守传》、《庐江冯媪传》、《古岳读经》、《谢小娥传》等多篇作品,可谓篇篇有致。李公佐的特长,在于编织异趣故事。《南柯太守传》的题材和结构,明显借鉴《枕中记》,但作者善于出新,设想出一个“蚂蚁国”来隐喻现实中的“官场”,把钻营者视为“蚁聚”,颇有讽刺意味。《庐江冯媪传》写冯媪遇女鬼事,表达了对被弃妇女的同情。《古岳读经》写作者探究水神事,情节奇异,别具一格。《谢小娥传》写烈女谢小娥

替父和夫报仇事,其中谢小娥请人猜谜、寻访仇家、遁入空门等情节,别出心裁,充分展现了作者较强的叙事功力。李公佐交友广泛,喜欢与同趣者征异话奇,所以在他的作品中,多有故事缘起的记述,也是一个明显特点。

元稹是一位名望影响甚盛的作者,他创作的单篇文言小说《莺莺传》,历来被视为佳作。《莺莺传》记述名门小姐崔莺莺与张生凄婉动人的恋情故事,沿着两人相见、相悦、相欢、相离、相绝的线索展开描写,在表现两人心理、思想和性格变化时,恰到好处地插入了多篇诗歌韵文,尤其对崔莺莺这个人物的刻画,细腻逼真,精密传神,让人读之顿生同情。作者以工文善辞的笔力,追求叙事、抒情、说理三位一体的创作形式,代表了此期大多数作者的审美意趣。稍后出现的李景亮《李章武传》,记述李章武与王氏妇生人死鬼相恋的故事,于怪异之中表现了真情不泯的主题。其艺术风格,李剑国评价说:“传之叙事,语语含情,极缠绵之韵,良足动人;笔致细而不繁,胜于《唐手记》之冗弱,善为文者也。李与王氏妇赠答诗凡七首,皆清婉可讽,颇有民歌风味。唐人诗每于小说出之,佳者时见,此其一证。”^[5](P325)可谓点出了此篇的特色和意义。

白居易的《长恨歌》和陈鸿的《长恨歌传》,是连体之作,可谓诗文俱佳,相得益彰。白居易和陈鸿介入唐玄宗和杨贵妃情事题材的创作,实乃受当时社会喜欢议论此事的影响。从文的角度来看陈传,作者在揭露唐玄宗沉湎声色的同时,敷衍了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条贯有致,特别是后半部分融入了作者对情事的理解,写来一唱三叹,悲剧味浓烈,正如鲁迅所云:“陈鸿为文,则辞意慷慨,长于吊古,追怀往事,如不胜情。……杨妃故事,唐人本所乐道,然鲜有条贯秩然如此传者,又得白居易作歌,故特为世间所知。”^[4](P49)可见《长恨歌传》的艺术价值。陈鸿的《东城老父传》,也叙唐玄宗朝的史事,通过对东城老父贾昌一生经历的铺陈记述,深刻揭示了玄宗朝招致天下大乱的原因,所谓“兆乱于太平矣,上心不悟”^[6](卷24, P681)。作者用采访式叙事,以小见大,也有可观之处。

被称为“吴兴才人”的沈亚之^[7](卷1《送沈亚之歌》),工文善辞,撰有《异梦录》、《湘中怨解》、《冯燕

传》《感异记》《秦梦记》等多篇文言小说,其作品数量可与李公佐相埒。《异梦录》叙一次士子聚会所谈邢凤梦见美人的故事,《湘中怨解》叙太学进士郑生路救准备投河的孤女而演绎出的一段情事,《冯燕传》叙当时广为流行的豪侠冯燕“杀不谊,白不辜”的故事^{[81](卷25, P693)},《感异记》叙沈警与仙女间悲欢离合的故事,《秦梦记》自叙梦中与秦国公主弄玉婚媾缠绵的故事。沈亚之诸篇文言小说的共同点:一是构思奇特,作意创新,其代表作《秦梦记》,不仅自己充当了作品中的角色,而且将现实与历史熔铸于一炉,“尤与同时文人异趣”^{[41](P48)}。二是将多种文体巧妙运用于文言小说创作,如《异梦录》和《感异记》中插入诗歌、《湘中怨解》中插入楚歌、《冯燕传》末的赞语、《秦梦记》中插入墓志铭等,尽显作者的文辞才华,也使作品增添了诗情韵味。鲁迅说沈亚之的作品“以华艳之笔,叙恍惚之情”^{[41](P48)},至为精当。

蒋防的《霍小玉传》,历来被认为是此期单篇文言小说中最成熟的作品,其后再无超越者。作品叙妓女霍小玉与新进士李益的悲情故事,社会文化内涵极为丰富。创作上的出彩之处,在于人物心理变化的细致描写,特别是霍小玉形象的刻画,围绕笃情而展开她的内心悲思,由淡而浓,终至李益绝情,推向最高潮。可以说,《霍小玉传》的成功,实际上反映了此期作者追求创作内容和形式完美统一所达到的艺术高度。

还值得关注的是,此期古文运动领袖韩愈和柳宗元也介入了单篇文言小说的创作。在韩愈“以文为戏”创作观和柳宗元“咸有笃好”滋味说的指导思想下,韩愈创作了《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等单篇文言小说,柳宗元创作了《李赤传》《河间传》和《童区寄传》等单篇文言小说。《毛颖传》以拟人手法叙兔毫笔身世经历,为文“滑稽”,极尽游戏诙谐之能事。《石鼎联句诗序》结构完整,叙事畅达,尤对轩辕弥明的刻画,突出其“奇”,颇有异趣,体现了古文名家的深厚笔力。《李赤传》写李赤为厕神所惑之事,《河间传》写贤妇河间转变为淫妇的异事,《童区寄传》写牧儿童区寄被劫逃脱之事,皆叙事完整精炼。韩、柳的作品,李剑国评价说:“事虽奇而不以事奇取胜,规模小说而以理趣文心为重,此古文家小说,别为一体也。”^{[51](P361)}此乃要言。

在这一时期单篇文言小说绽放出绚丽色彩的同时,文言小说集也呈繁荣景象,不仅数量增多,而且质量大大提升。较著名的有张读《灵怪集》、陈劭《通幽记》、薛用弱《集异记》、牛僧孺《玄怪录》、郑怀古《博异志》、薛渔思《河东记》、钟籀《前定录》、李复言《续玄怪录》、吕道生《定命录》、段成式《酉阳杂俎》、温庭筠《乾馘子》、李玫《纂异记》、李伉《独异志》、卢肇《逸史》、张读《宣室志》等,可谓洋洋大观。此期文言小说集的总体特征是,不乏工文善辞的科举士子的介入,在征异话奇的基础上开拓题材,追求人情味和诗意化的格调。牛僧孺的《玄怪录》,最具有代表性。首先,牛僧孺以进士之才和喜怪之趣,创作文言小说集《玄怪录》,又凭借后来将相之尊的地位,使作品集广为流传,对士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李复言的《续玄怪录》,就是因循续作。其次,进一步开拓题材,如《元无有》篇,明言故事虚构,是有意创作;《崔书生》篇,构思独特,虽写人狐情事,但融入了现实门第婚姻习俗;《郭代公》篇,写郭元振为民除妖事,亦颇新颖。其三,叙事流畅,充溢人情味和诗意化,如《元无有》、《柳归舜》、《滕庭俊》、《顾总》、《刘讽》、《张左》等,皆插入诗歌以抒情,颇适合当时士林的口味,读来情韵有致。

大体而言,此期诞生的作品,无论是单篇,还是集子,尽管大多数篇什依然借助玄怪题材,情节奇异,聊资谈趣,但故事的社会背景、人物的思想行为和价值观念等,更多地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显示了唐代言言小说繁荣期的特质。

二

唐代言言小说的繁荣,离不开现实的土壤,尤与科举制度盛行及其造成的文化风尚直接有关。

唐初设进士科取士,其考试科目格局随时而变,直到高宗时才基本定型。进士科的发展,唐初只考用骈文完成的策,后来加试以诗赋为主的杂文,又不断增加贴经的内容,但要求并不高,主要是为了防止试策的庸浅和试杂文偏重声韵。这些科目和要求,实际上构成了应试举子的修业内容和基本素养。由于进士科录取名额有限,竞争异常激烈,且应试举子具有用诗赋表达思想感情的才能,所以从太宗、高宗之际开始为社会关注,至玄宗时逐渐形成了推重进士科的风尚,所谓“不

由进士者,终不为美^[9](卷1《徵序进士》)。

唐代文言小说繁荣时期,观进士科的考试内容,仍沿着重杂文诗赋的道路发展,造成科举士子偏修诗赋的风气,其势不可阻挡。代宗时,礼部侍郎杨绾曾上疏指陈进士科试杂文诗赋之弊,所谓:“幼能就学,皆诵当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递相党与,用致虚生。建议恢复举孝廉,停废进士科等。然而,宰臣的反应是“举人旧业已成,难于速改”,翰林学士的反映应是“进士行来已久,遽废之,恐人失业^[31](卷119《杨绾传》)”,足见进士科举影响深刻,已经无法逆转。到了德宗建中二年(781),中书舍人权知礼部贡举赵赞又奏请取消诗赋试,《册府元龟》卷640《贡举部·条制二》曰:

先是,进士试诗赋各一篇,时务策五道,明经策三道。赞奏以箴论表赞代诗赋,仍各试策三道。

赵赞的用意非常明确,就是进士科举取消诗赋试,而且宁愿以降低试策要求作代价。赵赞于次年主试,当年进士试题有《学官箴》,看来他的建议获得了德宗的批准。然据清人徐松考证:“大约贞元之初,即复旧制。^[101](卷111)说明赵赞取消诗赋试的时间极短。

从国家选官的角度来看进士科举,偏重杂文诗赋试,的确不利于选拔吏才。所以,自德宗贞元以后,主试官开始以吏道和文学并重的标准来取士。贞元四年和五年(788~789),刘太真掌贡举,选拔了包谊、崔立之、杨巨源、裴度、杜羔等一批艺实之才进士及第。贞元八年(792),陆贽掌贡举,擢李绛、崔群、王涯、韩愈、李观、冯宿等进士及第,后多为宰臣名士,时有“龙虎榜”之誉。贞元十五年至十七年(799~801),高郢掌贡举,以经艺为进退标准,张籍、李景俭、白居易、戴叔伦、崔玄亮等进士及第。贞元十八年至二十一年(802~805),权德舆掌贡举,侧重“通理”和“辨惑”,收到了“非精博通赡之才,难以应乎兹选”的效果^[11](卷3《贡举》),其间拔樊阳源、许康佐、侯喜、贾餗、沈传师、李宗闵、牛僧孺、杨嗣复、陈鸿等进士及第,后亦多为宰臣名士。从主试官强调艺实标准和所取进士大多是诗文高手来看,只是稍稍扭转了过分偏重杂文诗赋形式的倾向,已经难以从根本上改变科举士子修业偏重杂文诗赋的风习。正因为此,宪宗元和、穆宗长庆时,主试官仍一再

要“斥浮华,进贞实^[31](卷159《四次公传》)。

至文宗大和七年(833),在宰相李德裕的推动下,进士科又一次停试杂文诗赋。《资治通鉴》卷224文宗大和七年年条曰:

上患近世文士不通经术,李德裕请依杨绾议,进士试议论,不试诗赋。……八月庚寅,册命太子,因下制:……进士停试诗赋。

《唐会要》卷76《贡举中·进士》亦曰:

七年八月礼部奏:进士举人先试帖经,并略问大义,取经义精通者,次试议论各一首。文理高者,便与及第。其所试诗赋并停者。……其所试议论,请限五百字以上为式。敕旨,依奏。

李德裕等人“请依杨绾议”,意在全盘否定进士科举,然文宗只是“患近世文士不通经术”,有抑文之意,但并不主张废进士科举,他说:“敦厚浮薄,色色有之,进士科取人二百年矣,不可遽废。^[12](卷44《选举志上》)于是,就有了经文宗批准的折中方案,即采用帖经、问义、议论新三场试的模式,主要是以议论代替原来的诗赋。事实上,正如文宗所言,进士取人二百年,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牵一发就会影响整个社会全局,不仅停废进士科做不到,就是取消杂文诗赋试也很难做到。所以这个新模式于次年实施后,随着十月李德裕的罢相,李宗闵的上台,很快被废弃,大和九年(835)进士科试杂文诗赋依旧进行。

可以说,一方面科举士子以杂文诗赋“浮华”的形式作为主修之业,另一方面取士标准逐渐转向强调艺实的内质,由此构成了这一时期进士科举的特征。它给一般科举士子所带来的影响,就是为了应试及第,在工文善辞的同时,还须提高经义吏道方面的能力。从德宗贞元时进士及第者的情况来看,学养和成就堪为一流,这对于推动文学的发展极为重要。

进士科是此期科举士子追逐和社会关注的主要科目,明经科的地位虽在官方文书中始终列于进士科之前,也选拔了大量中下层官员,但逐渐不为科举士子所看重,已成为事实,如宪宗元和时李贺就非常轻视明经出身的元稹,宣宗大中时崔彦昭应进士举不第,其外表兄王凝劝他说:“不若从明经举。^[12](卷183《崔彦昭传》)可见,应明经举与平庸联

系在一起。明经科地位的下降,除了儒学长期不振的原因外,尤与考试形式注重死记硬背有关,所以德宗建中时赵赞说:“比来相承,惟务习帖,至于义理,少有人通。”^[13](卷75《贡举上·明经》)贞元末柳冕指出:“今先章句之儒,后君子之儒,以求清识之士,不亦难乎!”^[14](卷527)虽然看到了问题,实际上并无有效的解决办法。

当明经科不断受到才学之士冷落之时,制举的考试科目也在发生变化。从唐初至代宗时,制举的科目名称经常随时而变,涉及面极为广泛,其中高宗时的辞殚文律等,武后时的辞标文苑、蓄文藻之思、文艺优长等,玄宗时的藻思清华、文辞雅丽、文词透逸、风雅古调、辞藻宏丽等,显然与选拔文学之士有关。唐代宗以后,为了适应现实的需要,体现最高统治者艺实并重的旨意,逐渐改变了多设文学之科的做法,据《唐会要》卷76《贡举中·制科举》的记载,除德宗建中元年(780)偶见“文辞清丽”科目外,基本定型为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军谋宏远堪任将帅、详明政术可以理人等科目。大凡制科不常开,故天子非常重视,要亲临试策,如德宗不仅亲临试场,还亲自阅卷批改。应制举一显艺实才学,能引起天子的注意,及第即可得清要官,所以应试者同样十分看重,如元稹和白居易,分别在明经和进士及第后再修制举业,一起入上都华阳观,闭户苦学,“意在决求高下”^[15](卷10),遂于宪宗元和元年(806)一举登科,扬名天下。应该说,这一时期的制举,还是颇有吸引力的。

此期吏部科目选中的博学宏词科、书判拔萃科和平判科发展较快,尤以博学宏词科为最盛。博学宏词科试诗赋论,与进士科试杂文诗赋相类,所以德宗贞元以后趋之者众,如李观、李程、李绛、柳宗元、王起、王涯等,皆进士及第后再登此选。韩愈也在进士及第后应博学宏词科,可惜未能中选。他的亲身体会,后来在《答崔立之书》中表述曰:

闻吏部有以博学宏词选者,人尤谓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术,或出所试文章,亦礼部之类。私怪其故,然犹乐其名,因又诣州府求举,凡二试于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于中书。虽不得仕,人或谓之能焉。^[16](卷16)

这里,所谓“人尤谓之才,且得美仕”,是说应博学

宏词科可以显才得美官;所谓“所试文章,亦礼部之类”,是说博学宏词科考法类同于进士试;所谓“犹乐其名”,表达了包括韩愈在内的一般科举士子的应试心态;所谓“虽不得仕,人或谓之能”,反映了社会士林对应选者文才的看重。博学宏词科通常每年录取3人左右,竞争极为激烈,故中选者自然名声大振。文宗大和二年(828)后,或停止制举,但科目选依然盛行,如进士出身的郑畋,于武宗会昌六年(846)登书判拔萃科^[10](卷22);进士出身的刘瞻,于宣宗大中四年(862)登博学宏词科。^[10](卷22)

上述表明,此期进士科、制举以及吏部科目选等取士非常盛行,不仅选拔了一大批才学之士,而且营造了文言小说繁荣的文化氛围。

三

唐代科举制度的盛行,始终不废杂文诗赋考试,尽管带来了一些弊病,但也使科举士子长久保持着对杂文诗赋的偏好,具有用文学形式表达思想感情的能力;由科举考试倡导艺实的变化,则促使科举士子提升经义吏道的素养,转而更多地关注学术和现实;而科举取士角逐奔竞的局面,又造成一些科举士子于场外征异话奇的意趣。这一时期文言小说繁荣与科举制度盛行之间的关系,可以从文言小说的作者身份和作品内容中,找到结合点。

就作者身份而言,据李时人《全唐五代小说》正编和外编所录,此期作者约计70人,其中确知进士身份者28人,分别为沈既济、刘复、郑权、韩愈、柳宗元、许尧佐、白居易、杨嗣复、陈鸿、牛僧孺、白行简、李公佐、韦、崔蠡、沈亚之、卢弘止、崔龟从、王洙、郑还古、卢求、房千里、钟籛、赵、郑处诲、卢肇、曹邺、薛调、张读;确知进士举子身份者5人,分别为南卓、李复言、温庭筠、李玫、罗隐;确知明经出身者2人,分别为赵业、元稹;直接制举登第者1人,为李景亮。合以上有科举背景者计,共36人,占此期文言小说作者总数的51%强,其中许尧佐、白居易、元稹、牛僧孺、崔龟从、沈亚之、南卓等,又应制举登科;柳宗元、白居易、元稹、杨嗣复、崔龟从、赵等,又应科目选登第。至于其余34人,除确知李吉甫、段成式以门荫入仕和李象先、刘无名为道士外,有些仅知姓名

官历,有些仅知姓名而不详生平,有些则佚名,他们的出身情况现已无法了解。由此,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此期文言小说作者的总体人数,大大超过了初兴期,他们对于文言小说的创作自觉和审美追求,共同造就了文言小说的繁荣。第二,具有科举背景的才学之士,已经成为文言小说创作的主力,他们具备工文善辞的素养,拥有独立自主的品格,充满征异话奇的情趣,假文言小说以寄笔端,有力推动了文言小说“至唐代而一变”的文学进程。^{[41] (P44)}

就作品内容而言,无论是单篇,还是集子,更多地将科举风尚和士子生活作为创作的素材,艺术地展示了这一时期科举盛行的现实状况。从单篇作品内容来看,沈既济《枕中记》、李朝威《洞庭灵姻传(柳毅传)》、许尧佐《柳氏传》、白行简《李娃传》、元稹《莺莺传》、沈亚之《异梦录》、蒋防《霍小玉传》等,这些大多出自于科举士子手笔的佳作,在叙述故事和刻画人物时,无不与现实的科举风尚紧密联系在一起,读者印象深刻的卢生美梦、柳毅婚娶、韩翃专情、荥阳生重振、张生薄情、亚之趣谈、李益绝情等情节,几乎都由科举线索牵动展开。

从文言小说集来看,不管作者是否科举出身,在他们所撰写的篇什中,有关科举风尚的内容,也大为增多,其中的一些甚至成了名篇。如卢肇的《逸史·齐映》,叙述宰相齐映进士及第前遇神仙的事,读来能够清楚地了解唐代科举士子的价值取向。作品曰:

齐相公映,应进士举,至省访消息,歇礼部南院。遇雨未食,彷徨不知所之。徐步墙下,有一老人,白衣策杖,二小奴从,揖齐公曰:“日已高,公应未餐。某居处不远,能暂往否?映愧谢,相随至门外。……齐公乃行,至西市北,入一静坊新宅,门曲严洁。……至中堂坐,华洁侈盛。……及晚请去,老人曰:“郎君有奇表。要作宰相耶?白日上升耶?”齐公思之良久,云:“宰相。老人笑曰:“明年必及第,此官一定。赠帛数十匹,云:“慎不得言于人。有暇即一来。齐公拜谢。……至春果及第。^{[17] (卷52, P1449)}

我们注意到,作者借助神仙的视角,向进士举子齐

映提出了选择何种人生的问题,所谓:“郎君有奇表。要作宰相耶?白日上升耶?齐映想了良久,最终的回答是坚定的,也即做官,当宰相。的确,对于大多数科举士子来说,进士及第,清要美官,这是难以抛开的俗念。

再如李复言的《续玄怪录·李岳州》,讲述了李俊请托中进士的故事,虚构成分明显,文学味道浓厚。作品开篇交待云:“岳州刺史李公俊,兴元中举进士,连不中第。次年,有故人国子祭酒通春官包佶者援成之。榜前一日,例以名闻执政。初五更,俊将候祭酒,里门未开,立马门侧。^{[17] (卷40, P1118)}等候期间,李俊遇一自称是“送进士名”的冥吏,得见拟送朝堂的金榜,发现自己再次落榜,垂泣悲叹。冥吏给他出主意,让他贿赂冥吏,于金榜中取同姓者,篡改其名,去而自代。李俊答应以阴钱三万贯行贿,于是冥吏让他在金榜上自注,找到一个叫“李温”的,揩去“温”字,注上“俊”字,玩了一个偷梁换柱的把戏。本来这段有趣的叙述,一看就是虚构的。然而,作者接着曰:

既而俊诣祭酒,祭酒未冠,闻俊来,怒目延坐,徐出曰:“吾与主司分深,一言姓名,状头可致。公何躁甚相疑,频频见问,吾岂轻语者耶?”俊再拜对曰:“俊愚于名者,受恩决此一朝,今当呈榜之晨,冒责奉谒。祭酒曰:“唯!唯!其声甚不平。俊见其责,忧疑愈极,乃变服伺祭酒出,随之到子城东北隅,逢春官怀其榜,将赴中书。祭酒揖问曰:“前言遂否?春官曰:“诚知获罪,负荆不足以谢。然迫于大权,难副高名。祭酒自以交春官深,意谓无阻,待俊之怒色甚峻,今乃不成,何面目相见,因曰:“季布所以名重天下者,能立然诺。今君不副然诺,移妄于某,盖以某官闲也。平生交契,今日绝矣。”不揖而行。春官遽追之,曰:“迫于豪权,留之不得。窃恃深顾,外于形骸,见责如此,宁得罪于权右耳。清同寻榜,揩名填之。”祭酒开榜,见李公夷简,欲揩,春官急曰:“此人宰相处分,不可去。”指其下李温曰:“可矣。遂揩取“温”字,注“俊”字。乃榜出,俊名果在已前所揩处。^{[17] (卷40, P1118)}

这里,提到的包佶、李夷简等人,皆为真有其人,写了李俊卑躬屈膝向故人包佶请托,包佶再请托于交情很深的春官,“意为无阻”,不料更有豪权相托,春官未能受托注李俊及第。包佶一怒之下,要与春官绝交。被逼无奈,春官改变主意,私启拟送中书省裁定的金榜,让包佶改注,包佶一如冥吏所为,揩去李温之“温”字,注上“俊”字,终使李俊进士登第。显然,这篇作品除了刻画人物维妙维肖外,着重揭示了请托背后贿赂舞弊的现象,讽刺辛辣,寓意深刻。

又如李玫的《纂异记·陈季卿》,记述了落第举子欲罢不能又思念家人的矛盾心理。江南人陈季卿,辞家10年,应进士试连不中,志不能无成而归,遂羁栖羇下,穷困潦倒,靠卖文章自给衣食。一日,他到青龙寺访僧,息于暖阁,见东壁有《寰瀛图》,乃寻江南路,因长叹云:“得自渭泛于河,游于洛,泳于淮,济于江,达于家,亦不悔无成而归。”^[17](卷49, P1364)作者对于落第举子欲罢不能又思念妻子家人的矛盾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接着,作者以惯用的文学幻设手法,借助陈季卿边上一个终南山翁所出的奇术,让陈季卿于虚幻中乘叶舟回了一次家。作品叙述曰:

旬余至家,妻子兄弟拜迎于门。
……此夕,谓其妻曰:“吾试期近,不可久留。即当进棹,乃吟一章别其妻云:“月斜寒露白,此夕去留心。酒至添愁饮,诗成和泪吟。离歌栖风管,别鹤怨瑶琴。明夜相思处,秋风吹半衾。”将登舟,又留一章别诸兄弟云:“谋身非不早,其奈命来迟。旧友皆霄汉,此身犹路歧。北风微雪后,晚景有云时。惆怅清江上,区区趁试期。”^[17](卷49, P1364)

陈季卿那份真挚的情感,一唱三叹,凄婉动人。作品未了说,两个月后陈季卿的妻子带着金帛来探望他,后年他终于进士及第。显而易见,《陈季卿》的故事,绝不是孤立的,它反映了唐代科举士子一心应试而致夫妇天隔一方、彼此思念的真实生活和情感。

其他同类题材的作品,如薛用弱《集异记·王维》,记述了科举士子向贵要请托的风尚;牛僧孺《玄怪录·崔书生》,记述了书生家族的门第婚姻观念;钟辔《前定录·陈彦博》,记述了科举士

子特重进士及第的普遍心态;段成式《酉阳杂俎·李秀才》,记述了科举士子与僧人交友聚会的趣事;张读《宣室志·谢翱》,记述了科举士子夜遇美人作诗朗吟的奇事。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显而易见,唐代科举制度盛行给文言小说创作带来了丰富的素材,而科举士子假文言小说叙写科举环境下的现实人生,施之藻绘,扩其波澜,则将文言小说创作推向了繁荣。

注释:

对于唐代言言小说分期界定、唐代言言小说兴衰与科举制度关系等问题的探讨,详见拙著《唐代言言小说与科举制度》第2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6页~第67页。

关于唐代言言小说作者身份的考析,详见拙著《唐代言言小说与科举制度》第5章的统计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96页~第243页。

考张洎《贾氏谭录》(俞钢点校,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所云:“世传《周秦行纪》非(牛)僧孺所作,是(李)德裕门人韦所撰。是知韦为《周秦行纪》之作者。”

参考文献:

- [1] 李宗为. 唐人传奇 [M]. 北京:中华书局, 1985.
- [2] 沈既济. 任氏传 [A]. 李时人编校. 全唐五代小说 [Z].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8.
- [3] 刘, 等. 旧唐书 [Z]. 北京:中华书局, 1975.
- [4]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 [5] 李剑国. 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 [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3.
- [6] 陈鸿. 东城老父传 [A]. 李时人编校. 全唐五代小说 [Z].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8.
- [7] 李贺. 李长吉歌诗 [M]. 《四部丛刊》本.
- [8] 沈亚之. 冯燕传 [A]. 李时人编校. 全唐五代小说 [Z].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8.
- [9] 王定保. 唐摭言 [A]. 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 [Z].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 [10] 徐松. 登科记考 [M]. 北京:中华书局, 1984.
- [11] 封演. 封氏闻见记 [M]. 《丛书集成》本.
- [12] 欧阳修, 等. 新唐书 [Z]. 北京:中华书局, 1975.
- [13] 唐会要 [Z]. 北京:中华书局, 1955.
- [14] 柳冕. 与权德舆书 [M]. 全唐文 [Z]. 北京:中华书局, 1983.
- [15] 元稹. 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自注 [A]. 元氏长庆集 [Z]. 《四部丛刊》本.
- [16] 韩愈. 昌黎先生集 [Z]. 《四部丛刊》本.
- [17] 李时人编校. 全唐五代小说 [Z].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8.

(下转第 125 页)

[8] 井上胜也,等. 老年心理学 [M]. 东京:朝仓书店,1980.

[10] 福祉士养成讲座编辑委员会. 地域福祉論 [M]. 东京:中央

[9] 金子勇. 都市高齢社会 と地域福祉 [M]. 东京: ミネルヴァ
书房,1993.

法规出版社,1999.

Analysis of the Need of the Old in Cities for Day Care Service

CA IL i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Abstract: This phenomenon arises from the fact that the day care service available can't meet the need of the old for daily care. Based on a survey of the need of the old for day care servic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present need for daily care of the old in cities in China, discu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ose old people who are willing to receive daily care service and the general needs of the old for day care centers, and offers some suggestions about the development scheme of daily care service for the old in cities.

Key words: day care service for the old, social service system for the old, community service for the old at home, cities
(责任编辑:江雨桥)

(上接第 117页)

Toward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lourish of Novels in Classical Chinese and Popularity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in Tang Dynasty

YU Ga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In the Tang Dynasty, on the basis of their initial success, novels in classical Chinese made breakthroughs when their creation reached the peak of flourish. Writers emerged in impressive numbers and famous novels came out which were as numerous as trees. A flourishing scene appeared which could compare favorably with that of poems. The flourishing development of novels in classical Chinese during Tang Dynasty could not be divorced from the reality soil, and particularly it wa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popularity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the prevailing cultural practice it had brought about. During that period, the highest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official examinations by the Ministry of Official Personnel Affairs for selection of successful candidates were in vogue or very popular. As a result, a large number of talents were selected, and moreover, a cultural atmosphere was built up in which novels in classical Chinese were flourishing. The popularity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in Tang Dynasty provided rich source materials for the creation of novels in classical Chinese, and the novels in pseudo classical Chinese by successful candidates in the highest imperial examination which narrate and describe the actual life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environment were full of literary elegance or embellishments, thus pushing the crea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novels to a new high of prosperity.

Key words: the Tang Dynasty, classical Chinese novels,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责任编辑:陈 吉)